

社会学家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 总第28辑 | 2008年第5辑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焱

茶座

【陈心想、胡叠、秋风等】

聚焦：戏剧与社会

【戴 舶】

两个传统与汉语写作

【黄章晋】

谁睡了谁，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我看《色·戒》

【张 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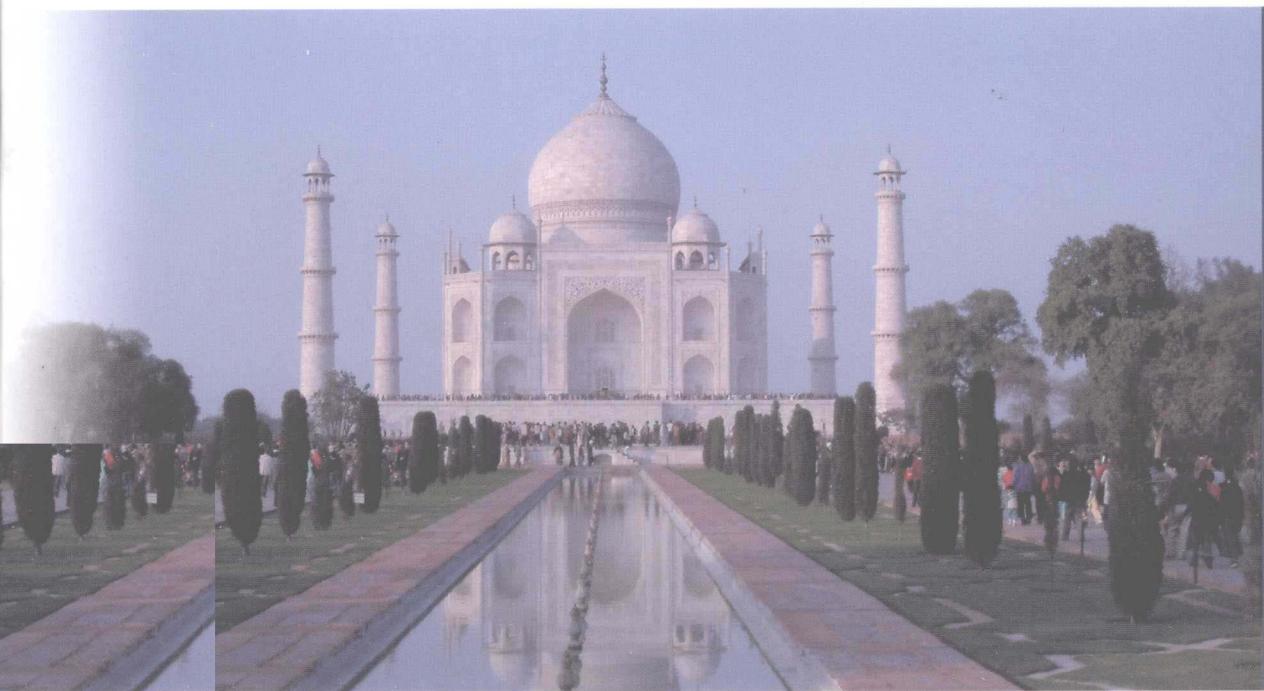
革命与母亲——关于自由、国家与女人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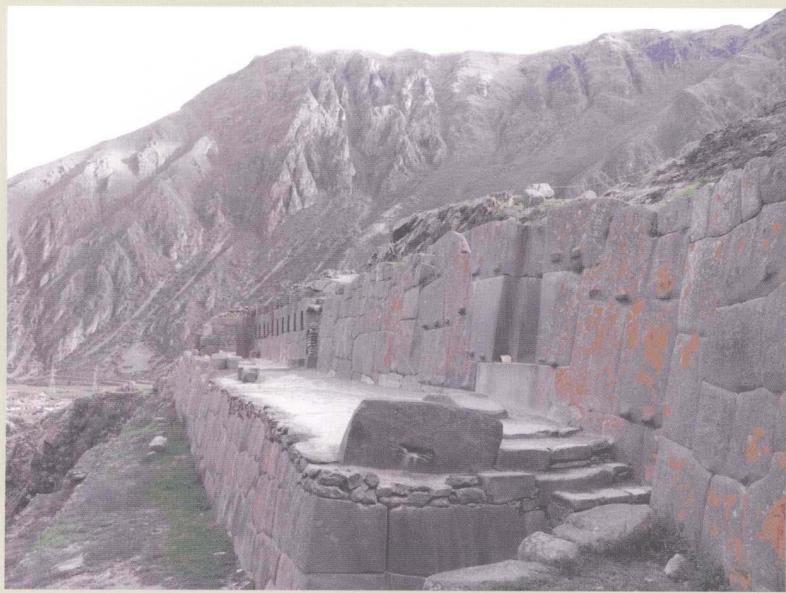
【黄裕生】

做暴发户，还是经济精英？

【祁冬涛】

对话：魏昂德教授（之二）





库斯科奥良泰坦博城堡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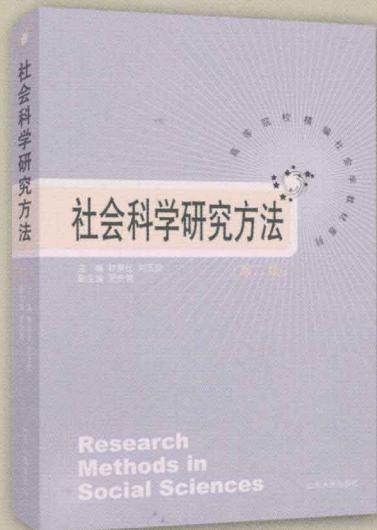
奥良泰坦博城堡遗址是另一处巨石文化，传说这里原来是坦姆博人的地方，后来被印加人征服并同化。印加人建立了这座军事要塞，山顶有太阳神庙。巨石文化和波利尼西亚酋长制有密切关系，现岛上居民约2000人，都属波利尼西亚人种。

(文见第152页)

新书推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一版自2004年8月面世以来，已多次重印，被国内多所高等院校列为研究生或本科生的学习用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钟爱。新修订的第二版及时吸纳了近几年来研究方法方面的新成果，更加适合读者的需要。

本书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大多数常用方法，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还不为人们所熟悉的重要研究方法，如社会网络分析法、评估研究等。因此，本书适用于社会科学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读者。它不但面向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也面向政治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新闻、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它不但适用于大学生，也适用于研究生。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二版），
林聚任、刘玉安等主编，42万字，
定价：38.00元

邮购免邮费。汇款地址：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收款人：山东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邮编：250001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联系人：宋先生

天地大戏场

旧时的戏台上常挂有一副楹联，道是“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用以解说戏剧与社会生活等相关关系，十分形象贴切。京剧名伶程砚秋先生当年说得好：“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而所谓伶人，“不过是戏中串戏罢了”。

还有一副常见的戏台楹联，道是：

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场便见。

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

上联是要人入戏，演好角色；下联却是要人出戏，摆正心态。言外之意是，能入能出，方为大英雄。虽然是一副联语，说起来却暗合于当代表演理论的两种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布莱希特。前者强调要入戏，演员与角色要合二为一；后者却主张要出戏，更强调间离效果，要演员成为自身角色的裁判者。据说曾有一位男演员由于入戏太深，乃至假戏真做，竟至于非礼了扮演情人的女演员，结果，他得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称赞，却受到布莱希特的严厉批判。

入戏太浅，固然演不好角色，可入戏太深的人，又往往“啄不破螺蛳壳，跳不出猢狲圈。其间恨塞鬼胸，冤迷胎舍，以至雄伏雌飞，阴颠阳倒，总如空里之华，梦中之物”[（明）李廷谟语]。所以又要出戏，高明的戏剧家戏中常要设置一位角色之外的旁白者，解说剧情，倚摭利病，评点人物，就是要通过间离效果叫人出戏。

不妨说，政治是表演艺术的最高形式，政治家就是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出一场场政治和改变社会的大戏的演员。当年一位美国人里根，由于深谙表演艺术的真谛，从好莱坞一路演到白宫，演得真是有声有色，至今仍被舆论界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有人说，终极而言，统治手段是由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决定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商业包装，生活方式无非就是一种戏剧表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戏亦真，真亦戏。

在清人龚自珍看来，治学也如演戏，“不善入者”，如“垣外之耳，乌能治堂中之优也耶？”“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优人哀乐万千，手口沸羹，彼岂复能自言其哀乐也耶？”所以，面对“优人之在堂下，号啕舞歌，哀乐万千”，治学者则要如“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眸睐而指点焉”，如此，才可谓“出矣”。演戏如此，治学如此，如果入主出奴，终非上流。其实，我辈身处大千世界，承担各式社会角色，又何独不然？

听，锣鼓又起，众生行将粉墨登场，如郑逸梅老人所说：“从此为悲剧，为喜剧，或生或旦，或丑或净，甚至或跑龙套，或打锣鼓，各凭前因，来了现世。”至于究竟演得如何，那就要看列位的修为了。



王 炎

2008年8月10日

目 录

卷首语 | FOREWORD

- 001 王 焱 天地大戏场

读者来信 | LETTERS

- 004 [安徽]吴先伍:问世间,“人”为何物? [北京]穆光宗:和谐社会拒绝“风险家庭” [武汉]刘洪波:我的“有色眼镜”

聚 焦 | PERSPECTIVES

戏剧与社会

- 011 陈心想 戏与拟剧人生观
015 胡 叠 鉴赏者说
022 秋 风 戏曲衰落的经济学分析

随 笔 | ESSAYS

- 031 陈蓉霞 怕,还是畏? 这是一个问题
036 戴 舶 两个传统与汉语文学写作
039 王晓华 那个“个体”——索尔仁尼琴精神礼赞
044 黄章晋 谁睡了谁,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我看《色·戒》
048 汤 军 分析中国社会的方法

社 会 | SOCIETY

- 050 黄裕生 做暴发户,还是经济精英?
054 王小章 个体为本,结社为用,民主法治立基——小议公民社会
060 李牧之 从阜阳个案看改革路向的选择

社会思想 | SOCIAL THOUGHT

- 069 王学泰 游民问题答问录(之一)
078 林济森 欧洲浪漫派的德国哲学根基
086 陈晓律 关于自由的思考——重温贝拉米《重新思考自由主义》

世 相 | MASSES

- 091 李安乐 后暴民时代：中国暴民探析
099 吴万伟编译 隐私值多少钱？

阅 读 | READING

- 103 张 念 革命与母亲——关于自由、国家与女人的思考
111 田方萌 敢问路在何方？——评福山《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
115 余凤高 患病之后：招魂、驱魔和顺势巫术(疾病的杜会史之五)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S

- 125 萧 瀚 社会理论的取径与中国法学研究
130 祁冬涛 对话：魏昂德教授(之二)
137 薛 涌 金 薇 传统重建中的《论语》——就《学而时习之》答问之二

文 化 | CULTURE

- 145 韦明铧 云南马帮(《浊世苍生》续写之十五)
152 张小军 南美第一古迹：马丘比丘(秘鲁文化考察随笔之二)

资 讯 | INFORMATION

◇集权体制的高效与低能 ◇奥运之后中国面临的挑战 ◇陈志武：为什么民众的收入赶不上GDP的增长？ ◇集体决策为何失误？

封二 库斯科奥良泰坦姆博城堡遗址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项目负责人 王海玲 执行主编助理 王 萍
责任编辑 王海玲 马 洁
装帧设计 王世强 张丽娜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06
E-mail: chazuo_shehui@hotmail.com
whl0501@sohu.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1
邮发代号 24-1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家茶座.第 28 辑/张立升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7-209-04569-8
I.社... II.张... III.社会学—文集 IV.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9967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读者来信

Letters

问世间，“人”为何物？

当我们登上高山之巅的时候，都喜欢极目远眺，去探寻那我们在平时所无缘得见、更没有机会加以接触抚摸的事物。这是因为，我们总以为那远不可及的新奇事物才是一个需要努力加以破解的谜团，反而对那些司空见惯的身边事物漠不关心，更谈不上思考了。然而熟知并非真知，越是一些我们接触频繁的东西，或许我们越是缺乏了解，这大约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吧。我们天天在和人打交道，但对于人，我们其实知之最少。

前段时间读书时看到一个神话故事，故事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众神在用水和土这两种基本元素创造了世界上的各种生物之后，又指派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为各种生物分配技能，以便它们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粗心的爱比米修斯为老虎配备了钢牙利爪，使它能够雄霸一方；为鸟儿配备了翅膀，使它能够长空翱翔；为鱼儿配备了游泳的技能，使它能够在水里自在地翻腾跳跃。总之，每种动物都获得了馈赠，却把人遗忘了，所以

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相比，“走不若马，力不若牛”，并不比其他动物有什么优势。普罗米修斯为了弥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将雅典娜神和赫菲斯托斯神那里的理性和火偷给了人，从而使人在世界上得以立足。

神话故事当然都有点荒诞不经的成分，但它却告诉我们，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之所以高出于动物之上，乃是因为人拥有唯有神才拥有的理性。“理性”之“理”不管是“推理”之“理”，还是“梳理”之“理”，或其他什么“理”，都是与“思考”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总是与思想、精神直接相关。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人具有物质性的身体，而在于人有思想、有精神。如果人类丧失了思想、精神，那么人不但不能成其为人，甚至就连牛马也不如了。然而环顾四周，我们不仅感叹，大家都太重视自己的身体，而精神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不信你走在大街上放眼四望，看看那些红男绿女们的穿戴打扮，或再看看那些灯红酒绿的饭馆酒店以及那些肥头大耳、膘肥体壮的食客们，就能够明白我们这个世界中身体对于人的的重要性。相反，你再看看书店里，除了

那些为了挤过独木桥的考生们外,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而读书的人可就寥寥无几了。国民读书量的日渐减少,也从反面反映出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在现代社会中比例的严重失衡。本来大学是思想活跃的精神殿堂,然而今日大学不但没有发挥出它对于社会的精神导向作用,反而受到了社会上不良风气的污染,对于身体的关注日益膨胀,精神反而变得日益贫乏了。现在的大学变得倒是越来越大了,而不要说堪称大师的人,即使是配得上教授职称的人也越来越少;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受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而大学的人文气息却越来越少;行政人员的地位越来越高,而为民办事的人却越来越少。似乎一切都与外在的、有形的东西相关,而无形的、看不见的精神,则因为其无形、因为其看不见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轻视。似乎只有财富与地位,才是思想的真正象征,大家可以不去读书、不去思考,而只需凭借一些歪门邪道发表几篇论文、谋取一定地位,就可以证明自己思想的高明、学术的精深。这样一来,高校不但失去了其精神导师的地位,反而成了社会恶俗的推动者。

本来,人是可以不必为精神问题而担心的,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子民,神始终都在关注着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以,我们一旦犯了错,神就会出来纠正你。再说你也不敢犯错,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犯错是会受到惩罚的。然而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神已不复存在,人类为了确

立自己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而亲手杀死了神。神死了,人类失去了监督,我们开始为所欲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样一来,我们就离人越来越远,而离动物倒越来越近了。为了保持人类的尊严,不至于降身为动物,甚至是牛马不如的地步,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人是什么?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们该做些什么?

[安徽]吴先伍

和谐社会拒绝“风险家庭”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低生育文化”。“低生育文化”包括了政府主导的“独生子女文化”和草根自觉的“儿女双全文化”。理性的生育求的是“好”与“福”。儿女双全是为“好”,衣食无忧是为“福”。但过去那种“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基本上没有了市场,很多调查可以支持这一判断。显然,这“好”与“福”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无儿无女怎么可能“好”?有儿女却无后的不叫“好”(如大龄独生子女伤残病亡),独生子女也难称“好”,因为这“好”字左边是“女”右边是“子”,合在一起才叫“好”。在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的今天,我们对“好”的新诠释就不再局限于儿女双全了,而是两全其美。中国人的“子福”观包含着对人生真谛的朴素理解。在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势下,仅仅从生育的数量和构成来看,“儿女双全”可谓大福,“两个孩子”可谓中福,“一个孩子”可谓小福。在理论上,我们探询到的生育幸福的底线



就是“两个孩子”，就是“两全其美”。作为人民利益代言人的责任政府需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生育的幸福。在基于生育幸福理论的两孩政策框架里，至于一个家庭究竟是生育一孩还是生育两孩，那可以是悉听尊便、自由选择的私权。

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风险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开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转变为“高风险家庭”。我们已经有了几千万独生子女家庭，其数量和比例在世界上恐怕是惊人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比例的独生子女，但倘若独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为主体，其潜在的风险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预想不到的严峻挑战。

从现在的眼光看，“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命题大致包括三个视角九个层面的理解。首先，对独生子女来说，其风险包括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成才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其次，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再次，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具体来看，其含义是：

第一，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风险。其风险性就在于其唯一性。特别是大龄独生子女死亡对一个家庭及其整个亲属网络精神上的打击

均是十分沉重的。

第二，独生子女的“成才风险”是指独生子女缺乏一个良好的可以实施“同伴教育”的成长生态，难以全面发展，智力素质与非智力素质发展的不平衡几乎成为共识。

第三，独生子女的“婚姻风险”有三种情势：一是成婚难，因为独生子女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强，生活能力却不一定高，现实生活中已经有父母亲自为成年独生子女找对象的新闻了；二是婚后冲突会比较多；三是婚姻寿命可能比较短。

第四，独生子女的“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所拥有的养老资源更少，有两种情势：一是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亲属的养老支持几乎是不存在的；二是独生子女群体对不育和独子生育的偏好可能更强。

第五，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作为唯一的养老责任主体，注定了独生子女的养老责任重大、心理压力巨大。俗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是脆弱的家庭结构。从长远来看，几乎所有典型的独生子女家庭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养老风险。

第六，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是指结构完整的三角形的独生子女家庭可能因为遭遇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而出现结构性的缺损，严重者可导致结构的瓦解。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是独生子女成人风险中最严重的一种。简单地说，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推演过程中，独生

子女风险家庭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残缺无后家庭，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伤痛。

第七，独生子女社会的“发展风险”是指这么一种担心，由于有的独生子女缺乏团队精神、缺乏吃苦精神，因此，可能会在未来时期的一定范围内影响社会发展的兵力供应。

第八，独生子女社会的“国防风险”是指在非和平时期，独生子女群体的战斗力是让人怀疑的。独生子女群体是家庭和社会神经的敏感点和脆弱点。家庭的牵肠挂肚构成了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政府的小心翼翼。

第九，独生子女社会的“责任风险”。这里说的责任风险是指一个文明社会的政府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越是大决策，越有大风险。风险决策必须承担起责任风险，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通则，所谓损失者补、牺牲者救、受害者助。在鼓励只生一孩的政策导向下，政府必须为独生子女家庭和社会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承担起防范风险、规避问题和补偿代价的三大责任。

上述九个方面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风险锁链，就好像生态学上讲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应该承认，风险只是发生问题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导向下，风险的放大却是必然。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因此家庭的种种风险其实都会以各种途径转化为社会的风险和责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风险细胞”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个社会就是不折不扣的“风险社会”。而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的冀望。所以，“独生子女文化”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继续风靡新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即育龄妇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1.3个）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长的内在活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等于独生的做法已经并将继续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的是“健康家庭”而不是“风险家庭”，我们追求的是“和谐社会”而不是“风险社会”。风险家庭越少，社会冲突越少；健康家庭越多，社会和谐越多。“健康家庭”独有的结构和功能使其具备抵御各种风险的结构性力量。在理论上，生育两个孩子是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但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多的事实，这一伦理的底线在多数地方也同时可以理解为政策的上限。虽然决策属于政府的责任范畴，求真属于学界的责任范畴，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无论如何是决策科学化的首要前提。

[北京] 穆光宗

我的“有色眼镜”

有评论说，某报纸报道地震时写人性的灰暗，而未能写够人性的美好，应该摘下“有色眼镜”。



美好也好，灰暗也好，都是人性的现实。从权利上讲，媒体可以作各种符合事实的报道；从伦理上讲，媒体应当为人性的美好而努力，但报道人性的灰暗，并不意味着主张人性应当灰暗。相反，为了人性的美好，需要正视人性的灰暗。

人各有“有色眼镜”，各种“有色眼镜”综合起来，社会就可能把“有色眼镜”摘下。社会应当感谢“有色眼镜”的丰富，反对“有色眼镜”的单调。规定和统一“有色眼镜”的制式，既是剥夺眼睛的自由，也会制造生活的误见。

下面是我透过“有色眼镜”看到的一些东西。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标语曾经刷上了全国各地的乡村墙壁，让人感觉孩子的处境真有“我们的祖国像花园”的意思。然而，地震的检验残酷无情，教育如何，孩子如何，倒塌的学校和夭折的生命已作了注释。

穷不穷，苦不苦，也不见得就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被誉为最牛希望小学的刘汉希望小学，由60万元投资建成，每平方米造价400元，在地震中安然无恙，而一些造价更高的学校却变成了孩子们的死地。我不知没有经历地震考验的地方，学校的“不塌指数”和孩子的安全指数又如何，与“我们的祖国像花园”的歌曲有多般配。

现在灾后重建已经开始，一定要记得，这次把学校建结实些。

有一位朋友说，刚刚发生了一次巨大

的“余震”。上网看了，原来是由姓余的文化人引发的“舆论地震”。

“余震”所要劝告的地震中遇难学生家长的一些事情，我有过耳闻，却未曾见过报道。非“余震”说起，估计很多人也不知道，经“余震”一说，大家都知道了。我想，这是要感谢“余震”的。

感谢之余，还有一些想法。对遇难学生家长“含泪劝告”，并非恶意，但劝止的理由呢，说来说去我只看到事有轻重缓急这一条还算贴切。但轻重缓急，人人有异，国有国的轻重缓急，人有人的轻重缓急，你有你的轻重缓急，他有他的轻重缓急，无非各相体察，难求一律。

往生者成了菩萨，因而不必挂怀；外人在看笑话，因而不要出声；地震7.8级以上，房子不塌就不合理论。这又是些什么劝告的理由呢？我所具有的一点文化，实在是苦旅不到这个境界去。

前几天看到一个专家意见的报道，讲建筑何以倒塌，与苦旅的文化学者所说的倒是相当，给我的感觉就是“地震级别高，塌了也合理”。

地要震，没谁拦得住；但楼要塌，却不是不可以预防，建筑防震是基本要求。而且不能说震级超出了设计，建筑塌了也合理，因为房屋受损，不见得一定要立地倒下，就像人抵抗不了艾滋病，并不意味着一旦得了就要立即死掉。

前几年阪神地震，房子并没有像得到命令一样纷纷倒地，震级是8级以上。这表明不是超过7.8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

会倒塌”。当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钱来实施这不塌的科学。问题是，规划、设计、施工、监理，如果这些方面的调查都到了位，再谈倒塌的主要原因是地震，那是可以的。这些情况还没搞清楚，就说主要原因在地震，不像负责的说法，而且怪天怪地，有什么意义？

有记者反省：“我想为灾区帮忙，却需要更多的人为我而忙碌。”“我不得不为我耽误了灾区领导和受灾群众的时间、占用了县里的救灾资源而深感自责。只有离开，才能终止这种耽误。”

有人发出评论，欣赏这种拷问、这种反省。我们必须破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遗留下来“意图伦理”云云。

确实，记者应反省，受访者在预先设置的“正确”议题的诱导下，满嘴假话大话空话；采访者会一门心思按照自己的思路打断采访对象的话语；有些电视主持人甚至根本无视对方的存在，自己滔滔不绝……

岂止于此。我听说在救援的现场，每有人抬出，往往可见记者扑上去拍摄和问话，盖在获救者眼上的布条被记者拉掉，“你感觉怎样”，“你在下面是怎样过的”之类的问题不断涌来。

记者应反省，但我不知这何以会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病有关。意图好就可以无所不为，是要反对的；然而，你不能把“意图”也一并反掉，人并非滑到哪里是哪里，大多数行为是有意图有目的的行为，一些众所追求的永恒价值就是最根本的

意图和目的。

就地震中的表现而言，需要反省的是生命伦理与传播伦理的关系，而不是笼统反省“意图伦理”以及所谓的“五四之恶”。一切基于生命，这就是一个意图，无可置疑地正当，媒体是否有把传播效果看得比他人的生命处境更重的情况，值得深思。

都江堰的中学教师“范跑跑”，这个正在上课的教师觉察地震后扔下学生跑掉，面对失望的学生，他解释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可能管的。”总之，“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因为如果有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救人，“是他的自愿选择，无所谓高尚！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也是你的自由，你没有错！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

一个人没有道德负疚感，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做事正当，另一种可能是没有道德。一件事做得正当，可以在这件事上没有负疚感；如果没有道德，那简直就是打了负疚感的疫苗，无论何事，都不可能负疚了。想一劳永逸，还是打负疚感疫苗划算。

不过，要去掉负疚感也行啊，你不要拉上一些好东西来陪绑。中学教师“范跑跑”扔下他课堂上的学生跑了，跑就跑吧，还要拉上“自由”、“公正”等等来垫背，好像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就会这样做似的，



人一追求自由和公正，就没有责任、岗位、职业要求可言；又像自由和公正太稀缺，非得让追求者跑掉，以便保存种子。

我确实看到一些自奉为自由追求者的人，正好就是反道德的先锋，好像道德就是绑架，就是大棒，善就是伪。我不知他们信奉的到底是什么自由，放弃人之责任的自由吗？有时候，他们会怪中国之不得进步，乃是因为没有宗教，但宗教是什么呢，对于一般的人，也无非就是一些道德律令和善的信仰，但这些不正是你们要坚决摒弃的吗？

人而无耻，百事可为，既然你只相信坐牢之事做不得，道德不在你考虑之内，还会有很多无耻之事可做。但你要做便做，不要还糟蹋一遍自由、公正的名声，说这是因为你皈依了自由和公正。

又看到《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乃是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兆山先生发表于《齐鲁晚报》的作品，却是以遇难者身份写的，属于代死者抒情。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感情代理》，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先生的词作，就是玩的“感情代理”的套路。

全词照引如下：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

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坦白交代：初读此词，我爆了粗口；再读一遍，又很想吐。常言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大概是快活的，难道王兆山副主席仿此意境，以为“吊唁能随之，做鬼也幸福”？幸福鬼又托王兆山副主席带话了，盼坟头有电视，是不是请有关方面办理一下，否则恐怕也有损于做鬼的“幸福感”。

上面写到“随之”两个字，这也是我近期见到的一个说法。有一篇评论员文章说：“国运将兴，竟多磨难；巨龙抬头，风暴随之。”大国要崛起，阵势看来小不了。还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重铸中国社会，也是在重写世界历史，我们懂得这会是怎样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还会有灾难降临，让它们来吧。灾难仍会像这次地震一样成就我们”。真是豪情万丈，灾难你们来吧，这是要成就我们。“随之”还有四言八句如下：“地震天佑，苦多情长；凶信吉运，多难兴邦。”我怎么看着像胡言乱语，“地震天佑”，“凶信吉运”，何解？

[武汉]刘洪波

戏与拟剧人生观

陈心想

伟大的英国剧作家、诗人威廉·莎士比亚说：“人生如舞台。”从这个观点出发，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创建了社会学里的拟剧论(Dramaturgy)，借助戏剧(theatre)的类比，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也因此有人直呼其为“戏剧论”。这个理论把人的日常交往和生活比拟为戏剧表演，每个人或是个体表演者或是剧班中的一员，生旦净丑在不同的舞台上、特定的场景下按照自己的角色要求来表演。这个框架是观察家与分析家研究社会行为所用的最古老的模式之一。社会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表演，按照脚本进行活动，而这些脚本来自先前的演出与演员。

戏剧舞台又可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上的表演者需要关注自己的形象和布景的限制，而后台的表演者则要显得轻松和自然。前台是粉墨登场的所在，演员在“前台”的表演，为了符合观众所期望的形象，演员还需要对自己进行“印象管理”。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总是努力把自己最闪亮的一面表现出来，希望给别人一个好的印象，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因此，演员要费尽心思化好妆，穿好衣服，背好台词，端起架势，使出浑身解数。当老师的要有老师的样子，当大夫的要像个大夫，不能像个街头混混，不符合社会他人对这个角色的期望。不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会混不下去了。每个人可以有许多个角色，在家里是妻子丈夫父母子女，在单位是领导员工教授秘书，在临时会议上是主持人演讲者等等。不管如何，每个职位都有一套相应的要求和规范，也就是对演员的规范和要求，达不到就不是个好演员。在拟剧理论下，确实如郑智化在《水手》里唱的，“生活就像在演戏”。而这些都是前台的表演。如果说前台是单位，那么后台是家庭；前台是公开的，后台是私下的。不同的情景下，人们有着不一样的表演，如果后

陈心想：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台的行为也是“演戏”，而把人生看做舞台，人们无时不在表演之中。还因为人在社会之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前台”和“后台”的区别，有时候会被认为“虚伪”和“言不由衷”等等。

对于人生的戏剧比喻，中国古已有之。潘光旦在研究伶人的时候，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生命等于戏剧，人等于角色。宋人倪君临终赋《夜行船》词开头两句，“年少疏狂今已老，筵席散杂剧打了”。并且潘先生认为这打杂剧的人生观在中国是很普通的，许许多多戏台上的对联也直接或间接地阐明这种态度。美国的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在《中国人的特性》（有人翻译为《中国人的素质》，参见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一书里这样写道：

我们真要明白中国人爱面子的理由，我们先得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戏剧的本能的民族。戏剧可以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公共娱乐；戏剧之于中国人，好比运动之于英国人，或斗牛之于西班牙人。一个中国人遇到什么问题而不能不加以应付的时候，他就立刻把自己当做一折戏里的一个角色……假若这问题居然解决了，他就自以为“下场”或“落场”得很有面子。假若不能解决，他就觉得不好“下台”。再若不但未能解决，并且愈闹愈糟，他就免有十分“坍台”的感触。再若问题之不易解决，是由于旁人的干涉或捣乱，他就说那人在“拆他的台”。总之，在中国人看来，人生就无异于戏剧，世界无异是剧场，所以许多名词就不妨通用。

潘先生说这段话“说得好”，说得确实好。因此，这里把潘先生引证明恩溥书里的话省略的地方摘录如下[参见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载《潘光旦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92页]：

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西方人看到这种做法，即使不认为荒唐，也以为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每当他的自我防御心理觉醒之时，即使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对大批民众。他会大声地说：“我对你说，对你，还有你，对你们说。”如果他的麻烦化解了，他可以自称在赞扬声中“下了台”；如果这些麻烦没有化解，他就会发现无法“下台”。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弄明白，就会知道与现实毫无干

系。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我们是不去大幕后面的，那样的话就会搅坏世界上所有的戏。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恰当地去做，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面子就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把号码锁。

在日常生活中，借用戏剧的比喻确实是俯拾皆是，比如，“给点面子，不然下不来台”，“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给哥们儿捧捧场”，“重打锣鼓另开戏”，“这是唱的哪出戏？”，“一个唱红脸，一个扮花脸”等等日常的用语，都是以戏剧来说人生和生活的。既然莎士比亚把人生比做舞台，学者们又发展出了拟剧理论，明恩溥说的中国人的戏剧思维，或者叫拟剧人生观，就不只限于中国人。虽然在娱乐形式上戏剧不再是当然老大，而且又日渐衰微，但是，积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拟剧思维方式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生活。

曹雪芹曾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对于戏剧里的演员而言，他们的演戏和生活，孰真孰假，则心理上浑然难分了。近人张次溪《伶苑》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

穆相（清朝满人穆彰阿——笔者注）孙之为伶也，家人强归袭伯爵，不可；或怪之，相孙曰：“吾以一身备帝王将相，威重一时，此何为者？”或曰：“子之帝王将相，乃伪耳。”孙笑曰：“天下事，何者为真哉？”客大惭而退。

潘光旦从心理角度上分析伶人的时候，曾提到这个例子，认为是人生失意的一种“补偿”。关于真和假的关系，此伶人笑问：“天下事，何者为真哉？”虽然有些消极，但仍是一种对人生洞深的体察领悟。

入戏太深，难分戏与人生实际生活的是真是伪的故事。《红楼梦》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第五十八回，曹雪芹用曲笔，借芳官之口讲述藕官和菂官的故事。

（贾宝玉）问他祭的果系何人。芳官听了，满面含笑，又叹一口气，说道：“这事说来可笑又可叹。”宝玉听了，忙问如何。芳官笑道：“你说他祭的是谁？祭的是死了的菂官。”宝玉道：“这是友谊，也应当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谊？他竟是疯傻的想头，说他自己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常做夫妻，



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菂官一死，他哭得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

菂官入戏太深，把演戏当了真，是可怜又可爱。以假作真而伤心悲痛，是其可怜之处；情感如此真挚，胜过许多俗世虚情假意，是其可爱所在。

观众和演员一样，也有人会入戏太深。而对多数人而言，还是会从戏里走出来的。“戏是假的，理是真的”，这是小时候听戏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的。许多人爱听戏，通过戏体验一种“典型化”的人生。明知道戏是假的，还是会被戏里人物的遭遇打动，流泪嘘唏。因为，“人生就是一台戏”。

有首歌中唱道，“一家子一台戏，那戏可不是好演的”。是的，每个人既是演员，又都是观众，想演好“戏”，确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生旦净丑在剧里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主角，有的是配角，有的是名角，有的是丑角。演得好的，“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春风得意，名满四海。可是，每个人不可能都做到这样，也不可能永远这样。琵琶女会老，时变景会迁。因此，人生的悲欢离合，世态的冷暖炎凉都像一幕幕戏剧一样，在人生的舞台上不停地旋转。不管愿意不愿意，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有时候为别人“捧场”，有时候要别人“捧场”，奔波匆忙里演绎着人生的悲喜剧，直到“谢幕”，曲终人散。这种人生观是借用了戏剧的比喻，因为戏剧的“理是真的”，拟剧论依的就是这个理，中国人的戏剧思维也依的这个理。可是，戏可以“重打锣鼓另开戏”，而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

《社会学家茶座》编辑部启事

《社会学家茶座》编辑部的联系电话改为 0531-82098006，投稿邮箱仍为 chazuo_shehui@hotmail.com，通讯地址仍为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邮编 250001，希望与广大作者、读者朋友们继续保持联系！

《社会学家茶座》编辑部